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人口现代化的理论再思考

■ 陆杰华 张宇昕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深刻论述，其中人口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人口现代化对于助力经济发展、重构社会文化、推进生态文明、保障国家安全以及推动民族复兴，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和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现代化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然而，国内学界却没有与时俱进地拓展研究，较少对各类人口现象进行理论统合，或较少融入人口以外的其他现代化视角。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背景，结合新时代人口发展的新特征，从人口总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四个维度，对人口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人口现代化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机遇方面，讨论了质量型人口红利、长寿红利、性别红利和配置型人口红利等发展优势；挑战方面，分析了超低生育率、老龄化加速、城乡区域发展不均、传统人口思维定式等方面问题。最后，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人口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思路与路径选择，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现代化的人口条件。

〔关键词〕人口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3）04-0005-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3.04.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得到了深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其中，“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问题，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关系到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2〕}。只有完成了人口现代化，才能为其他层面的现代化提供人力基础。因此，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际，进一步对人口现代化进行理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ZDA32）。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宇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2级硕士研究生。

论再思考,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中之重。

当前,我国的人口发展呈现出愈发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在生育率持续降低的背景下正式步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增至14.2%,老年抚养比更是高达20.8%;截至2022年底,我国出现了61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而当年的人口出生率已降至6.77‰,人口死亡率升至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加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人口发展新特征,人口发展的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愈发显现。本研究将通过梳理人口现代化的相关理论表述和文献研究,从理论上阐明新时代人口现代化的主要内涵及面向,客观分析人口现代化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前瞻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人口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思路与路径选择。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人口现代化的重要性

2000年前后,在计划生育的政策背景下,我国学界就人口现代化理论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然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入新征程,人口发展及其相应人口政策出现了新变化,重新思考和界定人口现代化理论便表现出鲜明的现实意义。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根本目标出发,人口现代化对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人口现代化助力经济发展。一般而言,人口规模越大,劳动力供给越充分,经济发展也越占优势。改革开放早期,我国凭借巨大的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我国青壮年人口占比下降,老年人口占比提高,社会抚养负担加重,传统的人口红利走向下行。在此背景下,人口现代化面临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劳动者技能素质的提升,将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另一方面,随着性别平等的不断推进,有利于促进女性平等就业,从而释放性别红利;而低龄老年人口的充分就业,适老化建设、医养服务等老龄产业的开发,也都将进一步激发长寿红利。可见,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既离不开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也需要综合利用人口结构特征。

第二,人口现代化重构社会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就要求所有人都能实现全面发展,整个社会的人口素质获得普遍提升。具体而言,提高人口健康素质有助于传播卫生健康的社会理念,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有助于推动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提高人口道德素质则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此同时,促进均衡的人口性别结构,将有利于改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而在人口规模日渐庞大、人口构成日益复杂的当下,还需尽可能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促进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简言之,不论是人口素质的提升,抑或人口结构的改善,都将使社会文化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转变。

第三,人口现代化推进生态文明。通常情况下,人口规模越大,能源的相对利用效率将有所提高,但城市的生产生活能耗也往往会增加,从而造成资源紧缺和环境损耗等生态现象。研究表明,人口集聚将对本地及邻地的生态福利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强度的提高能够缓解这种负向作用^[3]。此外,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越强,节能环保的生活方式也越能得

到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也将越顺利。因此,确保稳定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皆有利于建立一个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文明社会。

第四,人口现代化保障国家安全。人口均衡发展是高水平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而合理的人口规模首先能为社会生产和国防安全建设提供充足的人力支撑。首先,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着一国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相较于老年人,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行动表达都相对超前,其人口占比越高,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的风险均可能升高。其次,多民族的人口构成将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不但可能引发身份认同等问题,还可能导致一定范围内的群体性冲突,甚至上升到国际政治斗争领域。再者,人口的综合素质越高,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个人的国家安全意识也越强,越有助于构筑坚实的国家安全屏障。总之,适当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以及高质量的人口素质,都对国防安全体系的建立健全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第五,人口现代化推动民族复兴。整体来看,人口现代化客观要求人口规模保持稳定,人口性别结构维持基本均衡,人口年龄结构保持相对合理,人口综合素质获得全面提升。在此基础之上,社会经济水平才能得到长足发展,文化繁荣与社会和谐也将基本实现,不但生态文明建设将取得重大成效,国家安全也会获得有效保障,由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出良好的人口条件与社会环境。

二、人口现代化的文献回顾与评述

《大英百科全书》将人口现代化简要描述为起始于欧洲的两次世界人口转型^[4]。学界对人口现代化的界定则更加系统深入。我国对人口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刘铮最早提出了人口现代化的概念。他认为人口现代化以现代科技为社会生产的基础,主要包括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和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前者是指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基本特征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后者则是指劳动者能够利用所掌握的现代科技知识而推动生产力进步^[5]。也有学者详细阐释了人口现代化的相关要点,指出人口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着的概念,其现实进程往往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和特殊时期条件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发展以及与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不同步的特点^[6]。王秀银进一步对此概念进行完善,指出人口现代化是人口类型或人口变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包括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人口素质现代化和人口结构现代化^[7]。陈友华则从更广义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人口现代化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转向现代、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进、经济发展趋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8]。也有研究从时序视角对人口现代化的阶段进行了细分,认为人口现代化首先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转变,其次是人口身体素质提高和老龄化加剧,最后才是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增强^[9]。

在人口现代化的测量上,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指标体系。有研究建构了三个指数系统和八个具体指标。其中,人口转变指数包括了总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素质指数涵盖了出生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受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重,人口结构指数综合了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三产就业人口比重。经测算,国内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人口现代化实现程度表现出了明显差异^[7]。陈友华根据综合性、系统性、可操作性、易获得性、实用性、国际可比性与独立性等原则,提出了生育现代化、人口素质现代化、人口结构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四维度评价指

标体系,并分别利用总和生育率和婴儿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和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城市人口比例和非农劳动力比例以及人均GDP进行相应测算^[8]。其研究发现,中国各地的人口现代化在四个维度上并不同步,生育现代化推进情况最好,人口素质现代化建设次之,而人口结构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发展情况相对较差^[10]。还有研究以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为参照,引入人口可持续发展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构建出了整合性的人口现代化测度指标体系,增加了对逆人口现代化的测量,以便开展反面实证^[11]。

当一部分学者对人口现代化提出了多种测量方法时,另一些学者则据此展开了对人口现代化理论的实际应用,考察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口现代化发展差异。例如,有学者根据对安徽省人口现代化实现程度的详细测量,提出了安徽省加快人口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建议^[12]。安洪在对山西省人口现代化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后,还进一步指出其人口发展的内部差距,并强调了城乡人口现代化发展的均衡性目标^[13]。在评价江苏省人口现代化进程时,徐慷和李享纳入了人们对人口的社会、经济、生态状况的主观指标,更全面地描述了人口现代化的真实个人体验^[14]。也有学者聚焦于朝鲜族的人口现代化历程,分析了朝鲜族在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自然结构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现代化特征,认为优先发展教育和较早实施计划生育是促进人口现代化转型的有效政策^[15]。事实上,许多研究都重点关注了人口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问题,强调了教育事业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16-17]。此外,段成荣等学者总结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民族在人口现代化上取得的显著成果,研究指出,各民族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指标差距逐渐缩小,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也逐渐向汉族人口靠拢,各民族人口受教育状况大幅提高且差距不断缩小,各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也持续提高。然而,不同民族间的指标差距依然值得重视,且尤其应重视人口素质发展的不平衡^[18]。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当前国内学界有关人口现代化的文献已取得初步进展,在基本概念、测量方法、现实应用和政策建议方面都进行了相应探索。然而,对人口现代化的既有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首先,人口现代化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少,且大量研究集中在2000年前后。“人口现代化”的概念在首次提出时曾掀起了一阵研究热潮,但随后学界的关注度逐渐降低;人口现代化的研究并没有随着人口发展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调整,现有理论已经无法解答当下人口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其所处困境。同时,由于这些研究大多诞生于21世纪前后计划生育的政策背景下,其对于人口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判断常常缺乏较好的洞察力。当然,也有许多研究聚焦于人口老龄化或人口生育等具体议题,但少有研究用高度凝练的人口理论将这些现象问题统合起来。此外,随着我国迈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人口问题越来越与经济、文化、生态、政治等发展问题紧密联系,研究人口现代化理论需要结合更广泛的现代化面向。因此,本研究将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背景,结合新时代人口发展的新特征,对人口现代化理论进行重新思考。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现代化的内涵及其主要面向

自人口现代化提出以来,学者们就其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入讨论。而经过三十余年的人口发展与社会进步,人口现代化的内涵也应随之丰富和完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现代化主要体现

为四个维度，分别是人口总量现代化、人口素质现代化、人口结构现代化和人口分布现代化。这四个维度既相互作用，又共同受到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其有机协调则是人口现代化的直接表达。

第一，人口总量现代化是指人口规模应满足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当前，我国人口总量依然庞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储备。劳动力人口占比虽近年呈下降趋势，但仍高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享有人口总量的长期优势^[19]，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仍发挥着强大的建设性作用。此外，巨大的人口规模不但能够孕育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还能保障稳固的国防安全力量。出生和死亡是影响人口总量的主要变量，而生育水平现代化则是影响人口总量现代化的关键因素。生育现代化包含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两个方面，既往学界通常对人口总量抱有消极态度，认为生育数量少是人口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随着我国总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紧接着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人口现代化不应简单追求极低的生育水平。通常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理想的世代更替水平，换言之，适当的生育数量才是实现人口现代化的客观基础。高质量的生育也是人口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出生婴儿健康不仅影响长期的人口总量，还对个体身体素质和社会人口结构都产生着持续作用。总之，人口规模是最根本的人口要素，且制约着其他人口要素的变动，人口总量现代化因而也是人口现代化的首要基础。

第二，人口素质现代化是指国民普遍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并能在现代化建设之中得到充分发挥。人口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首先受益的是每一个体。人口素质现代化不仅意味着自由全面的个人发展，还能提高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当然，人口素质现代化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途，能够一定程度上克服人口总量、人口结构或人口分布的现实问题。具体来看，人口素质主要包括身体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其中，身体健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人力资本的核心。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各类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的罹患发作频率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和社会生产。因此，我国正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提高国民的身体健康素质。而随着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我国加快了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的步伐，既着力发展高等教育、又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既推动义务教育普及、又重视综合性素质教育。此外，思想道德素质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尤其是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人格健全、民族精神和治国理政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由于人口素质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且决定了社会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人口素质现代化也成为人口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第三，人口结构现代化是指人口自然结构保持均衡状态，即具有合理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健康稳定的人口结构不仅顺应了人口发展规律，还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口负增长的出现，老龄化和高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对社会各领域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资源消耗要大于生产，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经济负担；另一方面，社会普遍缺乏良好的适老环境，给予老年人生存发展的关注还远不够。因此，实现人口现代化不但要通过提高生育率来改善年龄结构，更要快速建立起完善的老龄服务体系，促进老龄人口高质量的生存与发展。性别结构失衡则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人口现象，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攻克的重大社会问题。均衡的人口性别结构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性别平等的进步，还能间接促进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并有利于生育水平的逐步回升。可见，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着

全局性的持续影响，人口结构现代化也应是人口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第四，人口分布现代化是指协调的人口空间分布。作为人口迁移的结果，人口分布主要体现为城乡分布和地区分布。我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欠发达人口大省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及邻近省份^[20]。人口流动是经济驱动下个体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制度设计与政策引导的结果。合理的人口流动有利于资源的充分整合利用，但畸形的人口流动则可能引发消极的社会后果。我国的人口分布存在着十分突出的城乡不平衡问题，这导致特大城市的资源日趋紧缺，难以承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则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基础服务设施老旧，乡村振兴更是缺乏人才支持和物质保障。而人口现代化既要求人口城乡分布的相对合理，又要求现代化建设和制度保障上的协调一致，由此才能促进城乡的均衡发展，保证城乡人口享有平等的基本权益。同样，人口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也将加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从而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完成。可见，人口分布影响了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影响，人口分布现代化也由此成为人口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现代化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一）人口现代化的新机遇

首先，我国的人口总量依然庞大，具有较大的人口回旋空间。近期，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详尽阐释，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越大，其在经济增长的动力、途径和方式上就享有更多的选择。譬如，既可以不断深化和细化专业分工，也可以保持原有分工体系；既可以选择扩大产业发展体系，也可以选择产业外移；既可以推动产业多样化发展，也可以聚焦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精专产业；既可以利用创新人才从事研发，也可以购买国际技术实现进步；既可以实现一部分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可以同时享受另一部分人口的早期劳动力供给^[21]。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早期，我国的人口总量优势依然存在。这意味着我国在较长时间内仍能保持较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相对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经济发展应充分利用好人口回旋空间。

其次，我国的人口素质得到普遍提升，逐渐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即经济发展的人口优势从年龄结构和劳动力规模转向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一方面，我国的人口身体健康素质得到显著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婴儿死亡率持续降低。另一方面，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也快速提升，不仅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增加，人口受教育结构也得到较大改善^[22]。当前，我国的数量型人口机会窗口已逐渐关闭，质量型人口机会窗口正加快开启。而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离不开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型，其关键在于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策略。

再者，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逐渐积累了长寿红利的发展潜力。长寿红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低龄老年人口社会参与增加所起到的经济推动作用，二是老龄人口规模和比例提高所产生的新增消费需求。具体而言，随着退休年龄的推迟和劳动形式的日益多元，具有丰富知识技能和经验储备的低龄老年劳动力也将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而随着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大幅提高和平均寿命的普遍延长，大规模老龄人口将创造出庞大的新消费市场，推动养老照料服务、适老化环境建设、医疗健康与科技、养老金融服务及保险、多层次终身教育、心理咨询等老龄产业

的长足发展^[23]。因此,应着力构建年龄友好型的就业环境,积极推动老龄产业的多样态发展,充分利用好人口长寿红利的窗口期。

同时,我国人口的性别比失衡得到一定缓解,社会性别平等也取得较大进展,为性别红利的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历年人口普查显示,21世纪以来我国的性别比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106.74降至2020年的105.07。随着全球性别平等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性在经济社会参与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同。为此,有研究对性别红利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的性别不平等将造成极大的财富损耗。由于女性在无酬劳动上的投入时间远高于男性,一年的实际人均人力资本财富损失可达11万元;而由于女性的健康状况显著低于男性,仅以重度失能水平为例,一年的非正式照护经济损失即为123.62亿至370.859亿元,正式照护经济损失则高达230.733亿至692.198亿元^[24]。作为性别平等的必然经济后果,性别红利的释放需要建构性别公平的社会环境。既要积极促进教育公平,又要着力推动全民健康;不仅应实施消除性别歧视的就业政策,还要完善生育支持的家庭政策。

最后,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创造了配置型人口红利机会。由于制造业内部存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不同梯度,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部门,或者在不同产业间进行流动,均能提高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我国人口流动较为活跃,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且呈现出向东部聚集的基本趋势^[25]。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高达约3.76亿人。在此背景下,充分认识到流动人口的经济潜力,推行日益开放的人口迁移流动政策,促进人口流动与产业转型相结合,有助于加快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宏观层面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整合配置。

(二) 人口现代化的新挑战

在充满发展机遇的同时,我国人口现代化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首先,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将长期存在。我国在早期的现代化进程中,实行“高投入,低效率,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但生态破坏容易,治理恢复困难,许多遗留至今的问题都需要花费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解决。与此同时,长期的巨大人口规模、不断增长的人均资源需求、过度人口聚集导致的环境恶化,共同加剧了生态系统的损耗。面对紧张的人地关系,应采取更加合理高效的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模式,提高技术效率、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其次,我国的超低生育率和加速度老龄化,将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重大转变,进而增加经济社会负担。一方面,我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生育政策放开的实际效果也远低于预期。超低生育率不仅将降低家庭内部抵御风险的能力,还将导致社会上新增劳动力的供给相对减少。加之受教育年限的普遍延长,短期内将出现劳动参与率的不足。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2021年,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社会影响越来越严重。老龄化加速不但会增加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因病致贫的风险,还会加重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上的养老负担。随着劳动力退出的加速和平均预期寿命日益增长,公共资源配置将向庞大的老龄群体倾斜,社会经济增长动力将严重不足。如何及时应对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再者,我国的人口分布呈现出结构性差异,对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从城镇化角度来看,大量青壮年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成为城市的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于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突出,但相应的公共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劳动力供给也难以满足乡村振兴的发展需要。城镇,尤其是特大城市人口聚集严重,虽然有利于地区的经济增长,但不同群体享有的各项资源权利存在着显著不均,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也常常面临挑战。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县城的增长动力明显不足,而东部地区城市容易出现臃肿和资源挤兑,地区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换言之,人口分布不均直接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差距,这在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变得更加复杂。

而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家庭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在生育率持续下降和人口流动趋于频繁的背景下,我国的家庭户规模日益小型化,2020年城镇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已缩至2.57人,农村亦缩至2.70人。在家庭户规模缩小的同时,家庭代际结构也从二代户转向以一代户为主,夫妻户和单身户数量快速增长。从类型上看,我国仍以核心家庭为主,但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形态^[26]。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了部分家庭功能被削弱,其中最突出的是赡养功能。在少子化、老龄化、空巢化的大趋势下,赡养责任部分地转移到了老年人身上,这同时体现在经济支持和照护支持上。具体来看,由于子代与亲代共同居住生活的比例大幅减少,代际关系中长辈权威逐渐旁落,家庭的赡养功能进一步弱化。

此外,传统人口思维定式的影响不容忽视。不少群众对人口数量仍然持消极看法,将庞大的人口数量更多地看作负担而非潜能,不利于激发人口的巨大能动性和创造力。一些民众对人口老龄化也抱以悲观态度,将老龄人口更多地视为经济发展的掣肘,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中巨大的长寿红利。而尽管我国的人口性别比明显降低,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依旧存在,人口出生性别比仍然偏高,对性别平等的推进形成了较大阻碍。因此,转变消极的人口思维定式刻不容缓,只有向大众普及积极的人口现代化观念,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区的人口统统纳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才能将人口现代化的潜力发挥到最大。

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人口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思路与路径选择

(一) 主要思路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提升人口现代化水平。在人口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牢牢把握住如下四个思路。

第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要旨。人口现代化作为一个群体性的统计指标,落在个体身上就是人的现代化。换言之,人口现代化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则是实现人口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因此,在人口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

第二,平衡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的关系。总量和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要素,二者的均衡发展是保持和发挥人口优势的关键。譬如,当前我国的老龄化趋势愈发严重,人口年龄结构失衡愈发突出,提高生育水平是一项重要的应对措施;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人口总量的变化,提早做好相应规划。

第三,超越传统人口红利,聚焦新型人口红利。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踏入新征程,人口发展也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征。应及时转变传统的人口思维定式，关注人口中蕴含的积极因素，与时俱进调整人口政策。尽管我国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已式微，质量型人口红利却大有发展空间；此外，不论是老龄人口潜在的长寿红利，抑或女性所带来的性别红利，都是未来人口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超前做好指标监测与预警。人口发展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对于推进人口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把握和利用好人口发展规律，提前做好专业化人口监测，及时进行前瞻性预警，为人口发展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二）路径选择

全面实现人口现代化，需要从多条路径出发完善人口发展的顶层设计。

第一，应完善人口现代化指标体系，制定人口现代化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再次引发了一股人口现代化的研究热潮。然而，人口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尚未建构完成，人口现代化的战略安排仍然缺乏充分的理论与数据支持。因此，当下最首要的工作便是对人口现代化进行理论研究和战略布局。

第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环境整治力度。人地关系矛盾是人类发展历史上无法回避的问题，人口现代化必须要解决人口对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应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以集约化发展逐步取代粗放式发展。另一方面，应加大对自然环境的整治力度，逐步恢复遭到破坏的多样生态系统。

第三，健全家庭支持，释放生育潜力。低生育率是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结果，但超低生育率容易引发人口负增长，长期的低生育水平还将对一国的整体安全发展形成重大威胁。我国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来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养育负担大大抑制了家庭的生育意愿。因此，健全托育服务等家庭政策支持，将有助于释放生育潜力。

第四，健全养老保障体系，推动老龄产业发展。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社会趋势，积极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变得尤为重要。针对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应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健全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使得老有所医、老有所养。同时，从长寿红利的思路出发，应抓住老龄化发展机遇，推动老龄产业的多层次发展，建立一个充分适老化的社会环境。

第五，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叠加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短缺，进而将造成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与社会抚养的负担加重。虽然我国的劳动力数量供给在不断减少，但仍然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效率来推动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具体而言，应加强基础教育建设，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应发挥人才的创新创造能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第六，变革人口迁移制度，完善公共服务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日益庞大，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流动的程度越来越深入。然而，由于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有待完善，城镇中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常常得不到根本性的保障，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因此，应加快人口迁移制度的变革，落实城镇流动人口的各项福利保障，推动高质量的城镇化进程；应加强农村基础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解决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第七，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流动人口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其经济收益通常只存在于流入地，流出地反而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损失。由于大多数流出地经济相对落

后,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因此,应在战略布局上向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适当倾斜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区域均衡发展,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 [2] 陆杰华,王金营,杜鹏,等.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笔谈[J].人口与经济 2023(1): 1-25.
- [3] 陈东景,刘卫毅.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J].西北人口,2023(3): 12-26.
- [4] KUMAR, KRISHAN. Modernization. [EB/OL] [2023-02-27].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modernization>.
- [5] 刘铮.人口现代化与优先发展教育[J].人口研究,1992(2): 1-10.
- [6] 中国人口现代化:挑战与展望[J].人口研究,2001(1): 24-33.
- [7] 王秀银.关于人口现代化的几点思考[J].人口研究,2002(4): 9-16.
- [8] 陈友华.人口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3(3): 64-70.
- [9] YANXIA, G. The Process and Pattern of China's Population Moderniza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From Quantity Dividend to Quality Dividend [M]//NAKRAY, K., YI, Z., CLAMMER, J., ZHANG, W.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in China and India.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159-185.
- [10] 陈友华.中国人口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J].人口学刊,2005(2): 30-34.
- [11] 王学义.人口现代化的测度指标体系构建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 46-51.
- [12] 黄鹂.安徽省人口现代化程度评估与对策[J].安徽大学学报,2005(5): 148-152.
- [13] 安洪.山西人口现代化的现状、问题和对策[J].理论探索,2007(2): 93-95.
- [14] 徐慷,李享.江苏省人口现代化进程评价研究[J].人口与社会,2014(2): 3-9.
- [15] 张天路,黄荣清.中国朝鲜族人口现代化的成就与经验[J].人口与经济,2000(1): 52-57.
- [16] 张天路,陈秀英.布依族人口现代化与民族繁荣浅析[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 15-18.
- [17] 袁红辉,穆艳.佤族地区人口素质现代化现状与成因分析——以临沧市为例[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3): 61-63.
- [18] 段成荣,黄凡,毕忠鹏.关于各民族共同走向人口现代化的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117-127.
- [19] 穆光宗,侯梦舜,郭超,等.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机遇、优势、风险与挑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5-22.
- [20] 马胜春.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析[J].人口研究,2022(6): 59-71.
- [21] 王金营,刘艳华.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回旋空间:存在性和理论架构——基于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和借鉴[J].人口研究,2020(1): 3-18.
- [22] 黄凡,段成荣.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质量红利——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2(1): 117-126.
- [23] 陆杰华,林嘉琪.长寿红利时代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战略视野及其行动框架[J].行政管理改革,2022(1): 20-25.
- [24] 陆杰华,汪斌.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基于性别平等视角[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3): 63-71.
- [25] 原新,金牛,刘旭阳.中国人口红利的理论建构、机制重构与未来结构[J].中国人口科学,2021(3): 17-27.
- [26] 麻国庆.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特征、趋势与展望[J].人口研究,2023(1): 43-57.

责任编辑:罗飞宁